中國與世界秩序評論

“天下国家”：解释中国的世界地位

本期作者：汪仕凯、陈沿潮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

主编：杨光斌
总第六期

（未经允许，不得引用）

中國與世界秩序評論

“天下国家”：解释中国的世界地位

本期作者：汪仕凯、陈沿潮

主编：杨光斌

总第六期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
Chenghai Institute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未经允许，不得引用）

“天下国家”：解释中国的世界地位

汪仕凯 陈沿潮

一、引言.....1

二、“天下国家”的内涵.....6

三、“天下国家”的理论基础.....19

四、“天下国家”的内部建构.....28

五、“天下国家”的外部实践.....36

六、结论.....51

阅读提示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蕴藏在这种定位背后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的世界地位。如果从中国政治传统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相交融的角度思考，可以将中国的世界地位界定为“天下国家”。本研究发现：

“天下国家”是继承天下传统，以“化”的精神进行文明互鉴，坚持“胸怀天下”并以自身文明成就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从而实现“和”的世界的国家。

“天下国家”以先进的制度体系和伟大的文明成就为核心内容，中国具有很多能够贡献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特质，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

“天下国家”是一种不断革新的文明，并且在发展中不断向着更合理的形态演进，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文明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蕴藏着人类政治秩序将走向天下大同的理想。

中国是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对“天下国家”形成自觉的，同时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核心进行着胸怀天下的外部实践。中国作为“天下国家”存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中从而发挥关键作用，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天下国家”：解释中国的世界地位

汪仕凯 陈沿潮

作 者：汪仕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沿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关键字：“天下国家”、中国、世界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引言

中国是世界大国，并且正在全球化过程中蹄疾步稳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复兴的中国已经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并且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深入推进，复兴的中国将对世界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世界对中国有着更大的期待，中国同样需要清楚解释自身的世界地位。进一步讲，中国在世界上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国家，中国的世界理想是什么，中国根据自身的世界理想开展怎样的行动，都需要予以明确的解

释。中国越是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程度越是深入，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的世界地位就越是重要。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解释，不仅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石。

多年以来，学术界和政策界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世界地位进行过解释。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新兴世界大国、核心国家、新中心国家等都是解释中国的耳熟能详的概念。毫无疑问，这些概念都能正确地反映中国的世界地位的一些侧面，但是这些概念尚未完全摆脱现代世界体系思维和话语的束缚，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实质和整体特性。党和政府在阐释中国外交政策时，将中国界定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毫无疑问，党和政府将中国界定为世界的建设者、贡献者、维护者是准确的，然而从理论上对建设者、贡献者、维护者背后共同的实质进行概括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在世界的建设者、贡献者、维护者背后的共同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90 页。

实质是中国的世界地位。世界地位就是指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核心利益、占据的位置、发挥的作用。具体而言，世界地位有着以下基本内涵：首先，世界地位以一个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为内在结构，这种结构集中体现着一个国家对世界的系统、成熟的看法，即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进行反思而获得的规律性认识；其次，世界地位是对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核心利益的集中概括，但不是从一个国家自身出发概括的，而是从世界角度、从这个国家与世界的关系角度概括的，因而这种核心利益必然包含着世界的共同利益，这就是说世界的共同利益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的重要构成部分；最后，世界地位规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行动，即这个国家在世界占据的位置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制定的目标、要采取的行动、能够发挥的作用和必须承担的责任。

如何才能准确地解释中国的世界地位？本文试图从中国政治传统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交融的角度进行尝试性的回答。具体而言，首先，中国有着赓续不断的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深深地塑造着中国对于自身世界地位的理解；其次，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是支持中国复

兴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是指导中国看清自身世界地位的明灯；最后，中国政治传统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交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的世界地位的生动实践，一方面是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部建构，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以统筹两个大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部实践。

如果从中国政治传统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相交融的角度思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笔者认为可以将中国的世界地位界定为“天下国家”。具体而言，“天下国家”是有着天下传统并且仍然秉持着天下关怀的世界大国，中国有着深厚的天下传统，胸怀天下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因此天下传统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资源，而且也是中国用以处理自身同世界关系的价值原则、战略思维和政策行动。质言之，中国在世界中是一个“天下国家”，“天下国家”是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一种理论解释，它集中概括了中国在世界上占据的位置、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天下国家”是一种解释中国的世界地位的理论，其用意在于将中国的内政发展和国际战略以及外交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的内政发展道路和外交发展道路，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紧密相连的，其基于内政发展经验而形成的理论知识可以作为解释外交发展的理论基础。[1]“天下国家”在经验上既涵盖以内政为核心的内部建构，又包括以外交为核心的外部实践，这就意味着在理论内涵上能够同时解释内部建构和外部实践，一方面以内部建构经验为基础的理论同时能够解释外部实践，另一方面外部实践经验能够丰富和发展基于内部建构经验所形成的理论。以中国的世界地位为主线，将内部建构经验和外部实践经验有机结合起来，是“天下国家”理论内涵的创新之处。

毫无疑问，将中国的世界地位界定为“天下国家”将是一种知识探险，但同时也是建构中国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本文以如何解释中国的世界地位作为问题意识，试图从历史的中国与世界的中国相互融合的脉络中提供一个初步的答案。本文的内容具体安排如下：首先，对“天

[1] 苏长和：《中国大国外交的政治学理论基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8 期，第 4-19 页。

下国家”的内涵进行初步的解释；其次，从理论上进一步解释将中国的世界地位界定为“天下国家”的理论基础；再次，在此基础上分析作为“天下国家”的中国所进行的内部建构；最后，呈现作为“天下国家”的中国“胸怀天下”的外部实践。在论文的结论部分，我们将简要讨论“天下国家”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天下国家”的内涵

“天下”和“国家”都是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因而将“天下”和“国家”两个概念简单结合在一起组成新概念的形式，很容易出现概念内涵上的复杂性甚至歧义，从而导致在解释“天下国家”的内涵时遭遇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天下”是比“国家”更广大的概念，并且“天下”有着超越“国家”的深远含义，因此“天下”和“国家”两个概念并不相称，导致“天下国家”在内涵上有着内在的矛盾。本文并不否认“天下”和“国家”之间的紧张，但是“天下”和“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着统一性。“天下国家”实际上集中体现着“天下”和“国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构成对“天下国家”内涵的理解基础，也突出了

这一概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天下”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概念，中国古代的政治活动多以“天下”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比较浅层的角度来理解，“天下”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天之下的广大无外的地理空间。“四海”、“九州”、“万方”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天下”的地理空间的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天下”是对立的，因为政治学理论界定的“国家”即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的核心特征是都有着界限清晰的领土，并由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对人口和资源进行有效支配，从而使政治秩序直接建立在民众支持或者默认的基础上。进而论之，“国家”意味着有限地理空间里的政治秩序，而“天下”则意味着广大无外的政治秩序。

从“天下”的角度看“国家”，“国家”当然是有其固有局限的，因为有限地理空间里的政治秩序很容易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西方学者认为战争是现代国家的起源，并且从军事-财政模型出发可以分析现代国家的建构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而后者的参与主体正是现代国家，因此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能证明，在有限地理空间里建立政治秩序的“国

家”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1]尤其是在百年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安全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过度安全化正在成为全球的焦虑”[2]，国家的局限性更是暴露无遗。如果从“国家”的角度看“天下”，则“天下”是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因为天下就是世界，世界是由“国家”构成的，世界实际上处在无政府状态，更进一步地说，“天下”或者说世界是没有政治秩序的。西方学者指出：“我们最常援引的世界政治理念建立在全球体系是无政府状态这一假设之上，也就是说，这一体系是基于相互竞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扩散和分散形成的。”[3]从现实主义的逻辑来看，“天下”所代表的广大无外的秩序实际上是一种空想。

“天下”当然有着地理空间的含义，但是在更深层上讲，“天下”意味着一种文明秩序。《诗经》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1] 陈周旺：《国家发展：超越“国家建设”理论》，载《探索与争鸣》2022 年第 9 期，第 80 页。

[2] 门洪华：《中国三大全球倡议的战略选择》，载《现代国际关系》2023 年第 7 期。

[3] 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与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7 页。

[1]其所表达的正是一种由政治中心建构的广大无外的文明秩序，这就是说“天下”有一个文明中心，以其光辉照耀着四方外围，在四方外围同文明中心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四方外围逐渐融入文明秩序，同时文明中心在四方外围融入的过程中也获得新动能，从而发展到更合理的状态。有学者指出，天下意味着“相信普天之下存在一种发达优越的文明秩序，可以为所有人接受。而一旦这种文明秩序及于全天下，天下也就成为一家。”[2]由此可知，“天下”的地理空间含义实际上根源于文明秩序含义，只有文明高度发达，才足以照耀四方，进而形成地理空间上广大无外的秩序。

地理空间上广大无外的秩序是文明中心同四方外围交流互动的结果，如果文明中心能够将文明秩序传播到四方外围，并且在此过程中文明中心能够发展到更合理的状态，从而最终将所有地理空间都纳入文明秩序之下，就能够形成“天下一家”的局面。《礼记》中庸篇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

[1] 《诗经》北山

[2] 梁治平：《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年版，第 24 页。

育焉。”[1]从政治的逻辑来看，“中”就是文明中心，“和”就是文明中心与四方外围在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形成的有秩序的状态，因此只有“致中和”，“天下”才能在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秩序，同样也只有“致中和”才能使文明中心更加发达，秩序由此才能逐步扩大。“天下”所代表的广大无外的政治秩序之所以尚未实现，实际上意味着一种能够集中人类文明精华、并且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文明中心还在形成过程中。然而，只要这个文明中心发展成熟，就能够为“和”的过程提供强大动力，并且使“和”的过程更加符合文明的性质，“天下”就能从理想变成现实。

既然“天下”有一个文明中心，那么从“天下”的角度来看，这个文明中心是什么呢？答案是国家。国家的出现意味着文明的形成，国家所能直接有效控制的地理空间就是文明的中心。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2]当然，作为文明中心的国家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建立了优良政治秩序、形成了先进制度体系、创造出伟大文明，进而胸怀

[1] 《礼记》中庸第三十一。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5 页。

天下、肩负着将文明秩序扩散到天下、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天下国家”。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天下实际上是由“虚”与“实”共同构成的、有着多重结构的事物。就“实”的部分而言，就是指以天子为中心的政权体系实际掌控的地理空间以及在其中形成的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是优良的，因此承载着这种政治秩序的地理空间就是文明中心。就“虚”的部分而言，就是指文明中心之外的尚未融入政治秩序的四方外围，文明中心需要在交流互动中将其政治秩序扩散到这些地理空间中，从而使之成为文明的一部分。由此可见，“虚”的部分就是有待于转化为“实”的部分，“实”的部分是“天下”的现实、实际，而“虚”的部分则是天下的理想、未来。由于“天下”是“虚”和“实”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天下”的内涵就有着复杂性，集中表现为对于究竟何谓“天下”莫衷一是。

虽然在思想上对于“天下”的内涵有争论，但是将“天下”中“实”的部分当作国家，仍然是“天下”思想中一种重要的倾向。王柯认为：“‘天下’从地理上可以分为‘九州’与‘九州之外、四海之内’这两部分，从方位上可以分为‘中国’与‘四

夷’，而在民族集团的层次上又可以分为‘华夏’与‘蛮、夷、戎、狄’。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异民族也被列入‘天下’的体系之中，这就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也直接提供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土壤。”[1]这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天下”实际上代表着以华夏文明为根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在政治实践上，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就是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国家。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就认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国家就是“天下型国家”[2]。因为“天下”并不完全是“无限扩张的世界”，而是“有数的诸国之集合”，“这一作为诸国之集合的天下，还可以根据九州、九畿等中层领域而被区画、统括。至秦统一天下，作为国、州（畿）之总和的天下，就转化为作为郡、县之总和的天下。而无论是‘封建’制还是郡县制，天下都是拥戴君主并可以分割的有限统治领域。”[3]换句话说，“天下”实际上就是大一统国家。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巨变中，以华夏文明为根基的多民

[1] 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5 页。
[2] 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9 页。
[3] 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4 页。

族的大一统国家，虽然历经磨难，然而仍在整体上得到保全并转型为现代国家，因而“天下”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被包摄于国家之中。[1]

继承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将“天下”的文明中心理解为国家的思想，本文从世界地位的角度将中国界定为“天下国家”。“天下国家”就是具有优良政治秩序、发展出先进制度体系、创造出伟大文明、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国家。具体而言，“天下国家”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内容：首先，“天下国家”是中国古代天下思想的延续，植根于深厚的天下政治传统，即虽然“天下国家”是有领土范围的，但是中国坚持“胸怀天下”的理想，以其发展成就贡献于世界。其次，“天下国家”以先进制度体系和伟大文明为核心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出先进制度体系和伟大文明，因此具有很多能够贡献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并为世界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的特质，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再次，“天下国家”是一种不断革新的现代政治文明，并且在发展中不断向着更合理的形态演进，即中国的现代文明既贡献于世界其

[1]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119-120 页。

他国家的发展，又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中学习优秀成果，从而在交流互动中获得不断更新的动力和资源。最后，“天下国家”是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中国的现代文明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蕴藏着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天下大同的理想。

诚然，“天下国家”从中国古代天下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但这绝非意味着要回归古旧的以华夏为统治中心的天下秩序，也不意味着主张建立由中国行使霸权的世界秩序。“天下国家”的内涵所要表达的核心理念是，要从中国政治传统精华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交融的角度解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是解释中国复兴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解释这种影响的性质以及发展方向，因此“天下国家”是一个立足时代、放眼全球的概念。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中国古代的“天下”思想有着丰富的治道理论，即关于公共事务治理的价值和方法，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理解“天下”思想的关键在于理解“合作共治的天下观”，即把“天下”思想中的治道理论运用于全球治理。[1]“天下国家”对于天下

[1] 李明明：《论天下思想中的政道与治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2 期，第 109-125 页。

传统精华的汲取正是秉持着类似的思路，即从中国所处的百年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出发，用天下传统精华来解释中国的世界地位。同样重要的是，“天下国家”对于天下传统精华的汲取是置于中国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整体理解中的，因此“天下国家”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着眼于世界未来、富于发展开拓性的概念。

“天下国家”不仅是根源于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的概念，而且是从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实践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概念。作为“天下国家”，中国以“化”为核心精神，一方面内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而发展成为文明中心，另一方面将本国的政治经验进一步外化，从而使世界在文明互鉴中达至“和”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的基本经验是，内化科学社会主义，突破国内的不平等结构和现代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结构，独立自主地在内部发展人民民主、推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外部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主权平等、推动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和共商共建共享国际社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愈加自觉地坚持胸怀天下，推进国家核心利益与世界共同利益的统一，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处理同世界各国关系的战略和外交行动，进而构建更加公

正平等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内部建构和外部实践集中体现了“天下国家”的内涵，因此，“天下国家”概念可以有效抓住中国世界地位的实质和整体特性。

“天下国家”是同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有联系但又有着本质区别的概念。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产物，它由经商品国际分工联系起来的世界经济体和国家体系共同构成。沃勒斯坦就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不平等。另一方面，政治行为最初产生于国家结构之内，而这些国家由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不同，结构也不同，中心国家中央集权化最甚。”[1]国际劳动分工和政治权势的差异将世界分成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后者在此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政治权势的差异实际上是“国际等级”，如戴维·莱克所言，“国际等级”创造了国家间的

[1]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4 页。

不同分工和相互依赖关系。[1]核心国家有着发达的现代文明，并且竭力将其文明扩散到世界，从而对世界进行征服、改造、同化，在此过程中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进行政治支配和经济剥削，文明的差异甚至成为核心国家进行政治支配和经济剥削的理由。[2]“天下国家”则不会以文明差异为理由压迫其他国家，反而会以自身文明成就贡献于落后国家的发展。因此，就两者之间的联系来看，“核心国家”与“天下国家”都有着发达文明、体现着文明中心的世界地位；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是，“核心国家”以其文明发达为由压迫其他国家，从而服务于自身中心地位的强化，“天下国家”则以其文明成就推动世界文明共同发展从而创造更合理的人类文明。

“天下国家”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之间的联系和差别，实际上反映出“天下国家”的深刻之处。具体而言，“天下国家”意味着世界是

[1]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2.

[2] 毛泽东在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谈话时就指出西方核心国家的性质以及中国同西方核心国家的差别。他说：“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又说：“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82 页。

一个有秩序的文明世界，人类社会是在文明基础上结成的有着共同命运的整体，中国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中重构自身同世界的关系、界定自身的世界地位的，以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世界共同发展，不仅是中国的责任，而且是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内在要求。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天下国家”概念是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理论解释，即从世界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复兴、理解中国复兴的世界意义，因此“天下国家”概念内在地包含着对立统一关系。具体而言，一方面“天下国家”有着对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形成的先进制度体系和伟大文明进行充分肯定的内涵，另一方面“天下国家”有着对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先进制度体系和伟大文明的固有局限性进行否定的内涵；但是这种对立关系有着能够统一起来的基础，因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形成的先进制度体系和伟大文明代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趋势、体现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天下国家”能够在发展中实现自我扬弃，最终克服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形成的先进制度体系和伟大文明的固有局限性，最终在以自己的发展贡献于世界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

三、“天下国家”的理论基础

将中国的世界地位界定为“天下国家”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的天下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全球化理论都和“天下国家”有着理论逻辑上的联系，因而都构成“天下国家”的理论基础。

首先，“天下国家”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天下传统。天下是一个悠久厚重的政治传统，它不仅使得“天下国家”这一概念能够被构想出来，而且使得中国的世界地位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毫无疑问，天下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它深深地塑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活动以及古代大一统国家本身，当然天下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实践的塑造，必须以良好的政治秩序和发达的政治文明为基础。从历史经验来看，儒家善政良治是天下理想能够变成实践的现实凭借，“而在晚清以来，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难以实现，所以才导致传统天下观日渐式微。”[1]道理显而易见，中国古代国家在面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的入侵时一败再败，从而被强制性纳入资本

[1] 王锐：《“天下”的近代歧说——对近代以来几种相关解读的辨析》，载《思想战线》2023 年版第 5 期，第 122 页。

主义世界体系中并失去文明中心的地位，因此天下观念自然由于缺乏现实力量的支持而失去光彩。

随着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中国正在赓续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创造伟大的现代文明，这为天下理想提供了现实力量的支持，天下理想蕴藏的普遍主义也重新焕发出生机。赵汀阳认为：“‘天下’所指的世界是个‘有制度的世界’，是个已经完成了从 chaos 到 kosmos 的转变的世界，是个兼备了人文和物理含义的世界。”[1]“天下”就是世界，这就是“天下”的普遍主义，即“天下”内在地蕴含着世界是一个由制度调控的有秩序的政治空间的内涵，“天下概念的重要性表现为这一哲学概念创造了思考问题的一个‘世界尺度’，它使得度量一些用民族/国家尺度无法度量的大规模问题成为可能。”[2]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世界制度，“天下”的核心精神就是“化”，“关键是要以己化他而达到化他为己”，“化”接纳多样性，同样强调

[1]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2 页。

[2]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5 页。

能够进行“化”的“一”的先进性。[1]“化”其实就是文明交流互鉴，其集大成者就是“和”，即有秩序的文明世界。

作为“天下国家”的理论基础，天下传统实际上表达着一种“国家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式的“世界主义理念”[2]，以及贯彻这种理念的世界秩序蓝图。因而“天下国家”意味着中国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以“化”的精神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进而在中国形成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同时中国的现代文明蕴含着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的先进要素，从而能够进一步通过“化”的过程贡献于世界各国的文明发展，最终形成世界各国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有秩序的状态。

其次，“天下国家”以共产主义理想作为最终目标，共产主义学说为“天下国家”提供科学指引。在共产主义学说看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

[1]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 页。

[2] 潘忠岐主编：《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8-49 页。

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相对于前国家状态而言，国家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为国家能控制冲突、建立秩序，使文明得以出现。但是，国家又是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国家最终将会被扬弃，人类社会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它“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

在国家被扬弃之前，人类社会要经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国家在这个历史时期仍然存在，但是国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社会共和国。马克思指出：“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9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 页。

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1]社会共和国就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国家，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国家的最高级形态，它的历史价值在于为无国家状态的共产主义社会做准备，进而完成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关键一跃。

作为“天下国家”的理论基础，共产主义理想意味着具有“天下国家”这一世界地位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着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更先进的政治文明。进一步讲，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在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进行竞争的过程中充分展现出先进性，一方面从实践上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吸引世界各国向社会主义道路靠拢，进而为人类创造更理想的未来。

再次，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为“天下国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5 页。

家”提供系统解释。在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中，享有“天下国家”这一世界地位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天下国家”的政治活动的最高目的。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具体体现为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不断地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天下国家”的政治的核心内容，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天下国家”的政治的核心内容也是不断发展的。

不断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将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同富裕，促进人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9-10 页。

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由此不难发现，正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发展出先进的制度体系，而且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天下国家”展现出其对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政治秩序、制度体系和现代文明成就的超越性，即“天下国家”所蕴藏的能够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指引的普遍主义性质的内涵日益成熟。

作为“天下国家”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意味着中国以其现代化成就重新成为现代世界的文明中心，这个文明中心正在创造伟大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并且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上已取得重大成就。因而，相对于现代世界的其他文明来说，中国是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更为先进的现代文明，从而构成文明中心向外扩散的现实基础。

最后，全球化理论为“天下国家”提供以现代世界发展经验为基础的理论资源，开拓了“天下国家”的理论视野。全球化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且构成复杂的知识体系，其中两个方面的内容对于“天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0 页。

下国家”而言非常关键。一方面，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人类社会在既往的全球化中已经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尤其是在经济上形成彼此交融的紧密关系，反映到世界经济结构上，“除了原来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循环外，新兴经济国家同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循环”即“更复杂的双循环”[1]。另一方面，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广泛共同利益，以及为维护和增进共同利益而推动世界各国合作的国际机制，“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国际机制可能对那些希望解决共同问题和追求互补的目标，而又不愿将自己从属于一个等级控制体系的各国政府来说，变得越来越有用。”[2]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必须深度合作的命运共同体，这的确是数百年来全球化进程的产物，也同样构成“天下国家”的现实基础。

全球化理论当然是对全球化实践的反映，其要旨在于世界各国在相互竞争、相互学习中日益相互

[1] 郑宇：《多面全球化：国际发展的新格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95 页。

[2]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3 页。

依赖，在相互依赖中蕴藏着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巨大空间，同时也预示着世界各国能够创造出发达的文明和有秩序的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高度肯定资本主义扩张推动的全球化所导致的历史性变迁：“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全球化进程以及作为其知识反映的全球化理论，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孕育着“天下国家”的要素，中国应在这一进程中积极吸收有价值的资源成就自己，同时以自身的力量校正全球化的方向，使其更加公平合理地纵深发展。

作为“天下国家”的理论基础，全球化理论意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 页。

味着中国要坚持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积极推动全球化向着更加合理和深入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应以自身的发展成就以及致力于世界各国合作的外交行动，为全球化进程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另一方面中国应统筹自身发展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两个大局，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机遇，最终使世界在全球化进程中创造出发达的文明成果，并使其为全世界共享、造福全人类。

四、“天下国家”的内部建构

“天下国家”是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理论解释，而中国作为“天下国家”的现实基础，则在于中国应当成为现代世界的文明中心。进而论之，中国必须完成包括建立优良政治秩序、形成先进制度体系、创造伟大现代文明在内的一系列内部建构任务。“天下国家”的内部建构，其实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而使中国成为现代世界最重要和最发达的文明中心，进而成为具备现实力量支持的、名副其实的“天下国家”。

“天下国家”的内部建构是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前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人民共和国，一方面终结了中国从鸦片战争以

来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另一方面种下了中国作为“天下国家”立于世界的根系，打开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广阔前景。毛泽东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际指出：“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可以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中国就是以“天下国家”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的，而且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推进，中国对于自身世界地位的认识愈发自觉。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天下国家”的内部建构在总体上体现为建立、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依托这一制度体系开展治国

[1]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43-344 页。

理政实践，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从而创造出发达现代文明。尽管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在人民共和国初期就建立起来，但是同中国实际相契合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必须在实践中反复探索、不断改革才能形成。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开始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逐渐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战略思维清晰且坚定，“就是要在坚持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将中国经济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1]融入世界实现发展对于“天下国家”的内部建构而言发挥着根本性作用，中国不仅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而且在吸收人类现代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中国现代文明。

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的政治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指中国

[1] 萧冬连：《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7 页。

共产党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的政治力量。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体系，它既要巩固中国共产党与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状态从而持续塑造人民，又要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保障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政治制度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作为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体系内含着“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因此这一政治制度体系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更为先进的政治制度，昭示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体现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体系在治国理政实践上集中体现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为治国理政提供权威，人民当家作主赋予治国理政以活力，依法治国则保障治国理政有秩序地进行，权威、活力、秩序的有机统一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体系高效地运转起来，而制度运转经验的积累和制度成效的整合将这一政治制度体系定型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指出：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将权威、活力、秩序有机统一起来的现代政治，有机统一政治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过程，或者说，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2]。诚然，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的独特创造，但是它在具有基于中国自身的独特内涵的同时，也具有人类现代政治的一般特性，它是中国在遵循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通过吸收现代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而进行的政治创造。就其一般特性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在于人民主权，就其独特内涵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人民主权具体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3]，“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0-31 页。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60 页。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27 页。

认识已经成熟，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孕育出优良政治秩序和发达政治文明，使得中国作为“天下国家”不仅具有坚实的现实力量的支撑，而且展现出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普遍主义光彩。

人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主体，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过程中塑造出来的整体性的政治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还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体系的根本性构成。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体系在治国理政中才能发挥强大的能力。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同广大群众实现了密切结合，使人民始终存在于政治生活中并作为国家的根基，同时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且服务于人民，因此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相互支持关系，在这种相互支持关系下，各种治理要素围绕着中国共产党进行汇聚，从而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协同合作，共同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6 页。

作用于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利益发展和公民权利保障。中国国家治理取得的巨大成就从实践上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体系具有强大的治理能力，在治国理政中发挥着强大的效能。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先锋队性质的政党。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过程中，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并且以自身的组织体系、思想体系和治国理政过程将广大群众凝聚成整体，从而领导和依靠这个整体不断创造现代文明成就、开辟人类历史新境界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在世界大局和时代潮流中把握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内在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把不断为增进人类福祉做出新贡献作为大国大党的世界责任。[2]从政党类型来说，先锋队性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53-354 页。

[2] 大国大党的世界责任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而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则是培养大国大党责任的阳光雨露，这就是说，大国大党的世界责任实际上作为特殊政党的普遍主义性质，

质的政党是特殊的，但是从人类现代文明来看，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又是普遍主义的，因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强大领导力量，而世界各国要想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就必须要有这种强大领导力量的支撑，否则就会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的制约而陷入国家治理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秉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并将其贯彻在领导治国理政的活动中，在实践中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为人类谋大同，开辟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总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体系的定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巨大成就的取得，都说明“天下国家”的内部建构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以其优良政治秩序、先进制度体系和伟大文明成就，重新成为现

在实践中不断积累、从一个国家向世界扩展的结果。林尚立认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其他政党完全不同，既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党，同时也是为人类谋大同的党，以为人民谋幸福之力为人类谋大同，实实在在，由点到面；以为人类谋大同之志为人民谋幸福，大开大合，由里到外。大志向、大情怀必然产生大格局、创造大事业、取得大成就。”见林尚立：《天下国家道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40 页。

代世界的文明中心。与此同时，普遍主义性质的文明要素也在“天下国家”的内部建构中获得生长和积累。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系统推进，中国的世界地位将被世界各国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自身也将对其“天下国家”的地位形成更清晰的历史自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天下国家”也将发展至更为成熟的状态，其内在的普遍主义的文明性质也会充分地展现出来。

五、“天下国家”的外部实践

内部建构是中国成为“天下国家”的现实基础，而外部实践则是“天下国家”的最集中体现。当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重新成为现代世界的文明中心，便开始更加自觉地进行“天下国家”的外部实践。“天下国家”外部实践的核心是以“化”的精神进行文明交流互鉴，在追求“和”的世界的过程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国家”的外部实践是一个从探索到系统推进、从初始到成熟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是中国对“天下国家”形成历史自觉的前提下提出的关于全面推进“天下国家”外部实践的战略构想。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就是以自身的发展成就贡献于世界各国

共同发展，从而在交流互动中使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到更理想状态的过程，这就是“天下国家”的外部实践过程。

现代世界是在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基础上形成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主导着现代世界体系，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政治支配和经济剥削，因此当下的世界秩序是不合理、不公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以革命打碎现代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性强制的结果，中国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历程，既是对世界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的揭露和反抗，又是积极寻求合作从而改变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历史性实践。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划分，从其深层内涵来说，就是在揭露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强制的基础上，指出了世界秩序变化的方向及其依靠的力量。[1]要打破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强制，改变霸权国家对世界秩序的主导，不仅需要第三世界国家对共同的境遇和命运形成共识，而且需要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协作，在共同

[1] 毛泽东在 1974 年会见赞比亚时任总统卡翁达时阐述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他认为：美国和苏联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属于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中间派，属于第二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日本除外）、非洲、拉丁美洲，属于第三世界。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1-442 页。

发展中壮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除此之外还需要联合第二世界、同中间派合作，积极分化霸权国家的同盟国。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创造出更值得拥有、更加合理的未来。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蕴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种子，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行动是从第三世界开始的。[1]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更加全面地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也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困境和争取更好发展前景的可能，故而更加深切地发现世界各国广泛合作、共同发展和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八大提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三个世界划

[1] 习近平在 2013 年 3 月访问俄罗斯时，3 月 23 日应邀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首次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空间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同年 10 月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应邀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明确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见《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 页、第 64-74 页。

[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分理论的升级版，它不仅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协作，而且强调世界各国的广泛合作；不仅强调世界各国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强调世界大国在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上有着更大责任；不仅强调世界各国要深入交流、相互借鉴，而且强调世界各国之间的平等互利和独立自主。

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体现现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理念，因此有待于中国与世界各国广泛协作，才能有效推进其建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一种集中反映了世界发展成就的现实，因此有待于世界各国对正在自发演化的历史进程形成自觉意识，并从战略行动上积极予以回应。作为一种战略构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行动包括：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年版，第 37 页。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87 页。

实现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等。[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说明中国不仅对于自身的世界地位已经形成充分的自觉，而且能根据自身的世界地位开展行动，从而履行其改造世界秩序、创造更发达的现代文明、开辟更合理的人类发展前景的世界责任。作为对一种有秩序的文明世界的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说明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共同的难以借助旧方案解决的艰巨挑战，只有对国家利益关系、社会制度关系和文明关系进行重构，世界才能实现共同发展。[2]世界和平和发展面临艰巨挑战的现实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彰显出中国作为“天下国家”的使命和责任。中国的世界地位是“天下国家”，而“天下国家”的外部实践可以集中概括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行动，能够从对外援助、统筹中国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坚持多边主义外交、推进全球治理、强化文明交流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87-288 页。

[2] 王存刚、孟凯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生产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 年第 2 期。

互鉴等方面进行说明。

首先，对外援助是“天下国家”外部实践的基础性内容。对外援助是“天下国家”的现代文明发展成就的重要表现，只有具备强大的综合国力，中国才能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也只有通过持续的对外援助，中国才能将自身发展成就中的普遍主义性质的文明要素扩散到世界各地，从而在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以普遍主义性质的文明要素为基础实现世界更深度的合作，将世界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对外援助是中国处理自身同世界关系的基础环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认识到对外援助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对外援助，至今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规模，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指出：“一九五〇年至二〇一六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累计对外援助提供援款四千多亿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五千多个，其中成套项目近三千个，举办一万一千多期培训班，为发展

[1]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7 页。

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二十六万多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吸引外资超过一万七千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万二千亿，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由此可见，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持续进行对外援助，积极贡献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

当然，中国的对外援助同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的对外援助并不相同，后者往往以本国的利益为立足点，故而对受援国提出种种政治条件，而中国的对外援助则以受援国的利益为立足点，中国同受援国是致力于共同发展的“伙伴”而非“同盟”[2]。中国对外援助的实际效果也证明了其对于世界发展的积极意义，“一方面，中国资本与东道国间构成的赢集相对较大，即东道国拥有更多操作空间。另一方面，中国资本的特征使东道国有了较大的议价能力。由于更长的盈利周期、更软的预算约束以及与东道国政府更为紧密的关系，中国投资者对东道国提出的方案将显得更为配合。这对发展阶段较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0 页。

[2] 任晓、郭小琴：《解析中国对外援助：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第 157 页。

低的发展中国家意义尤为重大。”[1]总结而言，中国的对外援助同“天下国家”地位是高度契合的。

中国复兴已经使全球价值链呈现“多级特征”和“多极化”趋势，在打破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霸权地位从而使权力向中国流动的同时，广大亚非拉国家面临着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2]因此，中国的对外援助获得了新的行动空间，这要求“天下国家”将对外援助和重塑全球价值链结合起来，在重塑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照顾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增加亚非拉国家的攀爬机会和空间，从而使全球价值链的分布更加均衡。重塑全球价值链将使中国的对外援助更为有效，因为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当前对外援助存在的制度协调成本高、受援助国家治理能力不强、援助项目的集成效果不佳等难题，进而演化出适合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新型发展合作模式。[3]

其次，统筹中国发展和世界共同发展是“天下国家”外部实践的基本目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

[1] 陈兆源：《投资国家能力：外国直接投资结构与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建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21 页。

[2] 庞珣、何晴倩：《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9 期，第 26-46 页。

[3] 郑宇：《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8 期，第 135-155 页。

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深刻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1]中国是在同世界的交流中成为“天下国家”的，因此只有统筹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天下国家”才能实现内在性质和外部实践的统一。

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虽然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在世界各国的分配并不平等，但是逆全球化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世界各国需要通力合作，改革不合理的国际制度，推动全球化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纵深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任务。[2]中国在全球化中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机遇，因此在全球化进程面临困难的时刻，中国应以自身的发展积极贡献于世界发展，从而为全球化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际大家庭。中国一直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8 页。

[2]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29 页。

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随着中国实力上升，我们将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的发展不会牺牲别国利益，只会增进共同利益。中国将同各国一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世界上的路，只有走的人多了，才会越来越宽广。”[1]中国在推动世界各国发展上肩负着越来越重的责任，更加主动、更加有效地统筹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使命。

统筹中国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除积极开放国内市场、拓宽经济合作、加大对外援助、实现互利共赢之外，中国必须在世界范围培养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依靠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实现的，中国经验充分证明，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发展道路是完全可行的，世界各国要实现共同发展，就不能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中国发展“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08 页。

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因此，中国对自身与世界共同发展的统筹需要世界各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同中国共同奋斗。

再次，坚持多边主义外交是“天下国家”外部实践的基本形式。习近平指出：“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多边主义践行得好一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就会解决得好一点。国际规则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认可的规则，而不应由少数人来制定。国家间的合作应该以服务全人类为宗旨，而不应该以小集团政治谋求世界霸权。”[2]多边主义既是数百年来国家间外交活动演化的结果，集中体现着世界各国为解决共同问题而得到的经验总结和理性反思，又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所系，集中反映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大变局背景下对国家间交往原则的要求。

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天下国家”的外部实践必须建立在尊重世界各国主权平等和国情差异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商互谅、合作共赢。“世界的前途命运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9 页。

[2]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59 页。

必须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1]，坚持多边主义外交，才能调动世界各国的积极性、汇集世界性的治理资源，从而掌握人类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指出：“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涉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2]在百年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霸权国家的冷战思维有增无减，单边主义外交抬头，多边主义外交受制于广泛代表性同执行力和制度化水平之间的矛盾，因而实践效果不佳，这给多边主义外交造成了压力甚至危机，因此多边主义仍然处在艰难的转型过程中。[3]但是，中国仍然坚持多边主义外交，积极推动世界各国围绕重大问题和共同利益进行协商，依托“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中国与东盟、中国与非洲、中国与欧盟、联合国等机制，不断积累多边主义外交的绩效，并以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身份，积极探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87 页。

[2]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31-232 页。

[3] 郑宇：《21 世纪多边主义的危机与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8 期，第 127-153 页。

索和建构符合时代背景和世界共同发展需要的多边主义机制。

复次，推进全球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是“天下国家”外部实践的关键所在。全球治理水平的高低，实际上构成评价“天下国家”外部实践成效的重要标尺。因为全球治理既有赖于中国的综合实力，也有赖于中国将其文明中的普遍主义要素扩散至世界各国和全球公共领域的能力。事实上，当下全球治理面临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难题，全球治理规则的不公平性质、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不利地位尚未得到彻底改变。[1]同时由于一些国家尤其是世界大国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意愿降低，全球治理的某些领域甚至陷入不可治理的困境，因此“天下国家”的外部实践必须以提升全球治理水平为关键内容。

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特别是在逆全球化萌动、多边主义机制受挫、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必须在全球治理中精准认识自身的世界地位。因为“确定本国的国家定位，以国

[1] 吴志成：《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6 期。

家定位为基础促进国家整合，并在国际社会中以一个完整而确定的身份参与世界事务，成为一个国家维护尊严、完成历史使命的核心议题。”[1]“天下国家”就是中国立足于天下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世界发展的现实挑战及前景而对自身在世界事务和全球治理中的精准定位。更明确地说，要提升全球治理的水平，中国必须从“天下国家”这种世界地位出发，承担更多的世界责任。

在中国对于自身的世界地位形成自觉以后，中国正在以自身发展成就积极贡献于全球治理，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通过提高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运转效能来提升全球治理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努力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之外建构新的更加包容、平等、互惠的全球治理机制，通过拓宽全球治理的渠道、扩大全球治理的资源来改善全球治理的水平。要言之，中国只有更加全面、系统地参与全球治理过程、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才能进一步将自身文明扩散到世界，在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创造出更发达的文明。

[1] 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3 期。

最后，强化文明交流互鉴是“天下国家”外部实践的重要渠道。文明交流互鉴，一方面要“化”，另一方面要“和”。“化”就是要从世界文明中吸收优秀成果，将其“化”为自身文明的一部分从而成就自己，同时也要将自身文明的精华扩散出去，“化”为世界文明的核心要素，从而贡献于世界文明的发展。“和”就是世界各国文明由于“化”的作用而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共处、和平发展的状态。“天下国家”本来就是一个有着深厚文明根基的概念，中国在古代就是在创造出发达文明、成为文明中心的基础上才形成“天下”观念的，在现代则是在吸收人类现代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成为世界的文明中心之后，才获得“天下国家”这一世界地位的。

文明是人类的创造性实践积累的成果，文明交流互鉴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同样是一个创造性实践的过程，必须调动世界各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习近平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

[1]中国作为“天下国家”，既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创造发达的现代文明从而成就自己，又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将自身文明中的普遍主义要素传播到世界，从而贡献于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进而论之，“天下国家”是同人类文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创造发达文明、不能以自己创造的文明推动世界文明共同发展，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向着更合理的形态发展的国家，不可能是“天下国家”。可以说，强化文明交流互鉴是“天下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内在于“天下国家”外部实践过程中的使命。

六、结论

“天下国家”是根据中国政治传统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而对中国的世界地位进行的概念化表达和理论解释。中国有着深厚的天下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对于自己的世界地位即“天下国家”形成越来越清晰的自觉。进而论之，

[1]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97 页。

[2]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97 页。

优良政治秩序、先进制度体系和伟大文明成就使中国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重新成为现代世界的文明中心。中国在积极吸收现代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伟大的文明成就，同时以其创造的文明成就贡献于世界共同发展，进而在交流互鉴中推动人类文明向着更发达的状态前行，中国与世界的这一关系体现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中国复兴使中国获得“天下国家”的世界地位，“天下国家”从世界角度集中解释了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复兴对世界的重大影响。中国作为“天下国家”存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就实践意义而言，“天下国家”内在的对立统一关系正在推动世界秩序发生转型，也使人类现代文明向着更加合理的状态发展。“天下国家”是占据文明中心位置的中国才具有的世界地位，一方面它肯定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的优良政治秩序、先进制度体系和伟大文明成就，另一方面它肯定“天下”的普遍主义特质，故而强调将文明局限于一国范围内的局限性。与此同时，“天下”和“国家”又统一于文明，文明要从国家扩散到世界，并在交流互鉴中走向更发达的状态，因此“天下国家”又体现

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天下国家”的普遍主义寓于中国的内部建构与外部实践。在内部建构的过程中，普遍主义性质的文明要素在中国获得生长和积累，从而使中国在创造伟大文明成就的过程中日益把握住这种普遍主义性质的文明要素。在外部实践中，中国以其文明发展成就积极贡献于世界，通过改变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制度，深入推动世界秩序转型，从而将中国复兴所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扩散至世界，推动世界文明共同发展。“天下国家”使中国对自身的世界地位形成充分自觉，进而从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实质关系出发统筹中国发展和世界共同发展两个大局，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把握住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从而成就中国也推动人类创造更发达的文明。

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发展都围绕着“天下国家”这一世界地位而展开。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中国不仅用行动更好地统筹中国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两个大局，而且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系统性地协调内政发展和外交发展，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使自己成为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世界大国，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发展确立典范，也为全球化进程提供动力。在百年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世

界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部实践，更加彰显出“天下国家”实践的根本意义。

就理论价值而言，“天下国家”概念超越了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模式的局限，从而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大国提供了更好的理论解释和价值引领。人类之所以要创建国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能够控制冲突、提供秩序，从而使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但是，现代民族国家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建立秩序的同时却使世界处于相互冲突的无秩序状态，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数百年的战争既推动着文明发展又限制着文明发展，对人类文明成果造成极大破坏。在竞争中获胜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虽然霸权国家能够将国家之间的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世界无秩序的初始状态，但是这种有限的成功是以霸权国家支配和剥削其他国家为代价的。“天下国家”内在的对立关系准确地把握住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局限性，而其内在的统一关系超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局限性。集中言之，“天下国家”使国家回到人类文明这一根基上来，不同国家的文明有所不同，因而需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作为现代世界文明中心的世界大国，要以文明交流

互鉴的方式将其文明扩散到世界，进而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创造更发达的文明，最终在公正合理优良的世界秩序的基础上实现天下大同。

“天下国家”是在文明创造和交流互鉴中形成、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发挥领导作用和承担世界责任的新型国家，它在性质上不同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或者霸权国家。“天下国家”概念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突破，这就是说，现代世界体系积累的积极成果与现代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性不平等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天下国家”这一新型世界大国出现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并由其解决上述冲突。因此，“天下国家”代表着一种对世界的新理解，即世界是各国共同发展、协商合作的有秩序的文明世界。由世界各国共同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必须围绕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生结构性转型，创造出伟大文明成就的世界大国在此过程中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当然，“天下国家”只是对中国的世界地位进行理论解释的知识生产尝试，蕴藏在其中的基本考虑是希望用植根于中国政治传统同时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的概念解释中国、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天下国家”不仅是对中国的世

界地位的理论解释，而且是在中国与世界融合的思想脉络中进行的社会科学理论创造。“天下国家”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时，同样需要将自身创造的社会科学理论向世界传播，因为只有这样的社会科学理论才能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世界地位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國人民大學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